

「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伟大开端

邓小平在

1978

石仲泉 陈登才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伟大开端

邓小平在 1978

石仲泉 陈登才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辽) 新登字 1 号

“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伟大开端

邓小平在 1978

Dengxiaoping Zai 1978

石仲泉 陈登才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70000 开本: 850×1168¹/₃₂ 印张: 8³/₄ 插页: 5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永富 版式设计: 王珏菲
封面设计: 李国盛 责任校对: 里宗

ISBN 7-205-02803-5/D · 593

定价: 9.00 元

目 录

导论	1
历史的回顾.....	2
1978：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伟大开端	10
邓小平——第二次伟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	17
一、历史转折前的理论较量	34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	35
邓小平与“两个凡是”的交锋	38
准确、完整理解毛泽东思想	41
邓小平谈毛泽东的晚年的错误	46
二、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53
“文化大革命”颠倒了什么？	54
拨乱反正在的最初尝试	61
胡耀邦提出真理标准问题	68
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72
真理标准问题上的较量	75

三、中国科学的春天	83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84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88
四、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与新构想	97
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	97
邓小平彻底否定“两个估计”	102
邓小平提出发展教育事业的宏伟构想	109
邓小平提出办教育的原则和方针	116
五、启动中国的改革	119
“不改革中国就会被葬送”	120
改革必须从经济战线入手	127
中国社会改革的开始	135
六、富民强国的新思路	139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139
先富与共富	145
富民与强国	158
七、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	160
邓小平主张欧洲的联合与强大	160
邓小平访日	163
邓小平访美	166
邓小平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则	171

八、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	174
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	174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	182
邓小平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形成.....	185
九、邓小平寻求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	198
“一国两制”构想的由来.....	198
“一国两制”的基本思想.....	213
“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科学构想	223
十、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	228
华国锋的设想被打乱.....	228
陈云提出六个问题.....	231
中央政治局的九条决定.....	234
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是“不妥”的.....	237
对两个农业文件的不满.....	240
要求改革开放的呼声.....	244
发现比例失调.....	250
呼唤民主和法制.....	252
恢复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	255
邓小平在闭幕式上的讲话.....	258
十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264

全会的中心议题和主要任务·····	264
全会吹响了“第二次伟大革命”的进军号·····	265
邓小平：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268
结束语 ·····	271

导 论

“革命”是一个伟大而神圣的词语，不宜滥用；特别是鉴于10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革命”的内涵和形象被歪曲和糟蹋得不成样子，更应慎用。但是从1978年开始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却不能不冠以“革命”的称谓。这是发生在这块古老大地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继第一次最伟大的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伟大的革命。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第一次最伟大的革命之后，经过近30年的发展又要发动第二次革命呢？为什么1978年会成为第二次革命的伟大开端呢？为什么第二次革命会由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来领导呢？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既是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舆论所关心的热点问题。

历史的回顾

要回答上述问题，不能不首先回顾新中国的历史。

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历史，如同中华民族的长江黄河一样，是以弯弯曲曲的形式奔腾向前发展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的革命，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随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仅结束了几千年的压迫剥削制度，而且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者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次革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在中国这个生产力的社会化水平十分落后，现代经济文化很不发达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个异常艰难的事业。没有建设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我们的党和政府不能不基本上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但是苏联的经验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给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 1956 年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探索是全方位的，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

化和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基本方针政策。这个探索取得极为可贵的成果，无论在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关系方面都提出了不少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和主张，有的还对传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观点有重大突破，并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度充满生机和活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曾为正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初步成功而欣喜、而兴奋。党的八大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对我们党在探索中获得的新的理论认识，新的政策主张作了辉煌的总结。

但是，历史正是这样无情地捉弄人。“福兮祸所倚”。如同任何真理再向前跨越半步就会变成谬误一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也没有逃脱这个厄运。社会主义改造的超前完成，使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没能冷静地思索这样大大地超前是否正常，而沾沾自喜，骄傲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取得的某些成功也使党的主要领导人自鸣得意，骄傲了！毛泽东本人说过：“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①但时过境迁，英雄难过胜利关。我们党的这一代领导也犯了这样的错误，毛泽东晚年也犯了这样的错误。当然，当时的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原因是异常复杂的，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有国内因素，也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7页，第948页。

有国际因素，不能简单化。但是，在取得一系列的成就和成功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不谨慎了。毛泽东愈到晚年，他所进行的探索愈益曲折，正确和错误交织，或此起彼伏，或并行发展。到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60年代中期，在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上其错误的东西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他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探索如何使社会主义不改变颜色，但这是步入“歧途”的探索，是陷入“误区”的探索。

在探索的道路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犯了两大错误。

一是在经济工作方面贸然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推行“左”的经济政策，有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空想论”倾向。

毛泽东认为，学习苏联经验搞建设，只依靠少数专家，被繁琐的规章制度所束缚，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两种思想、两种方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在他看来，经济建设应当搞群众运动，“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①，打仗、搞阶级斗争可以搞群众运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不能例外。在反冒进之后，毛泽东带头倡导那种脱离客观实际的超高速度和超高指标，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40条规定的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指标，用7年左右时间实现原定15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指标（甚

^① 1958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听取汇报时的讲话。

至提出要在15年内赶上美国)。与生产力发展规定的超高指标相呼应,在生产关系方面提出了如何通过一系列变革实现共产主义。在这样“左”的思想指导下,发动了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那时“左”的思想表现在各个方面,就经济方面,而言,它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为害时间最长、恶果最重的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空想论”。它的主要内容是:急于将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改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追求“一大二公”,不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被完全取消,连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小集体所有制经济急于向大集体所有制经济转变,大集体所有制经济急于改为全民所有制经济;急于改变按劳分配政策,实行名曰具有共产主义因素实为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急于扩大产品分配,缩小商品交换,市场调节被窒息,价值规律在一段时间内被否定;急于破除“资产阶级权利”,否定物质利益原则;无视中国落后的客观实际,一度企图实现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穷过渡”。这种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空想论”和在其指导下开展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给我国本来就不太发达的生产力水平造成了严重破坏,使国民经济出现了极度困难的形势。三年“大跃进”带来三年大困难。毛泽东反思这个错误时也承认:客观规律,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①

^①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二是在政治关系方面，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改变了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进而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发动了使国家遭受 10 年劫难的“文化大革命”。

鉴于苏共 20 大揭发出来的前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阴暗面，以及随后在东欧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为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改善党群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中央于 1957 年春天提出了全党整风的任务。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的过程中，出现了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放肆地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逆流。对右派的进攻坚决反击，对反社会主义思潮开展批判，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当时党的领导人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开展反击斗争性质和规模没有谨慎地把握，结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造成了极为不幸的后果。这个后果主要表现为，一是在人的处理上，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长期受到委曲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在理论认识上，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即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同不断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矛盾），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时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我国内部的主

要矛盾，并且宣布我国社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被列入了剥削阶级的范围。这成为党后来一次又一次地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源。

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改变，不仅不能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和改革旧的经济体制，以发展生产力，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来立论，势必容易造成把党内外对政治经济形势、对方针政策和对工作评价的不同认识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同志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有些用语较为伤人），则被认为是党内的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因而错误地大规模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其波及面远远超过了反右派扩大化。这次斗争，一方面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打断了在此之前8、9个月的纠“左”进程，使“左”的错误得到更加恶性的发展。

政治方面的失误是“一波三折”。为了渡过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从1961年初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许多经济政策有较大改变。经过将近两年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随着形势的好转和调整政策的深入贯彻，再加上中苏争论的激化，党内领导层对形势估量和工作指导上的分歧又有了发展。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一些意见，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

并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进一步发展了在反右派斗争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提出直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随后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这就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更加扩大化和绝对化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的错误的、过火的批判终于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线。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最伟大的革命中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制度已经基本消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不再存在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的任何现实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在共产党执政 10 多年后，党和国家的肌体中存在诸如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某些阴暗面，对于这些消极腐败现象需要加以揭露和纠正，但必须作出恰当估计和具体分析，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而绝不能搞“大民主”，“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等极端错误的做法。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骨干；所批判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这场所谓的“革命”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并

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在各个领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是空前的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惨重灾难。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者达 1 亿人以上。国民收入的损失达 5000 亿人民币。第一次伟大革命取得的成果濒于毁灭，中国共产党人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制度岌岌可危。

“文化大革命”乱党、乱国、乱人民。不结束“文化大革命”，党无宁日，国无宁日。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76 年 10 月的胜利本来应当成为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历史起点。但是，由于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指导思想没有跳出“左”的窠臼，奉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迟迟不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口号，压制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正确思想路线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受到迫害的老干部出来工作的进程以及平反包括 1976 年 4 月“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此外，在经济工作中又求成过急，继续推行一些“左”倾政策，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这样，从 1976 年 10 月开始的两年实际上是徘徊前进的两年。因而 1976 年 10 月没有能够像党和人民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历史的新起点。

1978：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伟大开端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70多年的历史，进行的两次伟大革命实际包括三个发展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的第一次伟大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发展阶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的第二次伟大革命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至今还在继续，并已经顺利地移交给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来领导，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如果说1921年7月党的创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开端，因而是第一个起点；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因而是党的历史发展第二阶段的起点；那末，1978年12月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则既是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开端，也是党的历史发展的第三阶段的新起点。

为什么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成为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开端和党的历史的第三阶段的新起点呢？这里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第二次伟大的革命和为什么要进行第二次伟大的革命。

党的十四大指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